

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

沈展云 梁以墀 李行远 编



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



粤新登字 05 号

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

沈展云 梁以墀 李行远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75印张 1插页 520,000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360-1468-6/I·1307

定价 13.80元

60657/57

内 容 提 要

中国知识分子是改造和建设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可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却是遭受极左的思想路线伤害最为灾难深重的一群。

王实味因杂文《野百合花》的牵连，最后无辜被杀；胡风上书三十万言，结果被罗织为“反革命集团”罪，锒铛入狱，株连甚广；在“反右扩大化”中，被错划“右派”者多达数十万之众，他们被禁，劳改，流放，历尽艰辛；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家村”冤案轰动一时，其他如老舍、傅雷等著名人物，也都在斗争中纷纷惨死……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材料翔实的信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声讨极左路线的檄文。其中，许多文字都出于死难者亲友的手笔，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前 言

从“五四”运动算起，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真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如果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时刻算起，也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雨年华。

回顾这段历程，我们发现，在人类已往的历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都与其民族的命运有过如此紧密的联系，如此地浸透着血与泪的联系。我们感受到强烈的、命运的悲怆之情。

我们编集本书，奉献给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尤其是奉献给仍在为祖国的自强、奋进而贡献心血与力量的中国知识分子。

—

早在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决定，在开头部分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批评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

理”；他最后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20页）可以说，这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篇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宣言，它的着眼点是知识分子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它反对了王明左倾路线对知识分子采取排斥、打击的错误方针。

建国以后，在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反对了左倾宗派主义低估知识分子进步作用的错误倾向。

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重申了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的，极力纠正自1957年开始的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严重的左倾错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思想路线更是旗帜鲜明地否定和清算了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十年动乱期间极左路线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摧残，否定和清算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冤、假、错案，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

历史表明，知识分子政策，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得到正确的对待，国家就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当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受到挫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国家和民族也就同时落入灾难的深渊。

历史还表明，什么时候我们放松了对左倾错误思潮的抵制和批判，知识分子就会面临着厄运和灾难。

所有这些以生命和血泪换来的教训，我们不应轻易忘记。

二

“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是并不统一的。

1957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那是

以“高中毕业”为界的。1980年版的《辞海》列举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是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这是有代表性的传统定义。本书所收的“知识分子”也是属于这一范围之内

的。

其实更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职业、文化程度，而在于作为一个阶层，它的禀赋和气质，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倾向。

“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先用之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它指的是特定的一群人，他们一般在大学里受过教育，大都具有西方文化的思想背景和行为教养，自成一个有别于传统阶级结构的社群。他们互以思想相启蒙、以奉献相激励，他们那时眼睛闪耀的是为人类自由、平等而奋斗的焰火。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一提到“俄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在一切正直而又有历史教养的人们的心目中总会涌起一种敬意。

在古代中国，文人与士大夫显然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知识分子”。他们所生存的空间中有种种罗网在束缚着他们的灵魂，比如在立身、前途上的科举取士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的儒家经典桎梏、日常生活中的宗法伦理关系，等等。关于政治，他们有时会表现出济世的热肠，但又不乏进退之道。在兼善与独善之间总是有游刃的余地。无怪乎鲁迅谈起他们总会有一种辛辣的批判意味：“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

也有貌似是另外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压根就离不开政治，用徐复观的话讲，他们“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究其实，所谓“政治”，无非是大一统时代的皇权或多元分裂时代所追逐的皇权的代名词而已。

然而，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不同概念、形象均不能套用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中国历史的急剧震荡、变化催育出一群新的知识分子。“五四”爱国运动便是他们的起点，以后的历程

更无须赘言了。当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胜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随之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

建国之后，先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不另注出处者均同此）——这“不幸后果”实际落在多少知识分子的身上，恐怕难有准确的统计。只是据从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到1980年5月8日为止，有55万余右派帽子全部摘去；这“严重扩大化”的含义是，“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占原戴帽者的0.0018，即不足万分之二。

然后是六十年代，“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再接着就是从六十年代延接到七十年代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这里的“许多”，恐怕是永远也无法统计确切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百万计。

无论是平静还是动乱、欢欣还是悲泣，从1949年到1976年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一个在建国之初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他会有几个二十七年？一个在建国之初已届中年的学者，这二十七年恐怕就是他的余生了。二十七年风雨频仍，纵有盖世豪情，禁得住几番吹打吗？

四

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总爱问一个“为什么”。尤其是这样的一段历史，那问号是巨大而沉重的。

中国知识分子屡遭厄运的社会原因是：

一、对知识分子的厌恶之情和在知识文化问题上的反智色彩，一直是农民革命中屡有验证的深层意识。毛泽东当年就指出在军队的干部（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中，“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后来军队进城、南下，接管、改造乃至“反右”，“恐惧”可能不再，厌恶、排斥却有更多的机会酿成和发展。当然这种深层意识公开表露出来的时候是很有理论性的，并不显得粗鄙无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是革命主力，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党的领导逐渐深入到业务领域，与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对知识分子中不能与在工农群众中一样走群众路线”等等。这是1957年有代表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言论。

二、过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总是轻而易举地使知识分子声名狼藉，成为任何政治冲动的最合适的出气孔。《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像这些今天听起来恍若隔世的话语在当年可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

三、从历次运动，尤其是从“文革”的历史来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党内的残酷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相信亲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还会记得发生在1966年6月至

7月间的事态。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四、迫害他人者的文化素质与长期受极端意识形态熏陶的心态，使他们习惯于以激烈、残忍的行为方式来对待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首先是在北京的中学里发明了剃阴阳头、挂黑牌、以皮腰带抽打，而这些迫害者都只是18岁以下的中学生。过去人们常用无知和单纯来解释这些娃娃的行为。事实上，无知与打人并无必然联系。何况中学生，尤其高中生、大学生的文化程度在整个社会上看已经绝不是无知的阶层。单纯是有的，但行为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想方设法从肉体上、心灵上折磨受迫害者的本身已经是很不单纯。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中首先应该具有的现代人类生活的共同的、基本价值准则的十分贫乏。而这就是长期以来教育本身的失误。

社会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统一体，上面所举的原因只能是荦荦大者。

但是，来自知识分子本身的因素也是不可略而不谈的。

五

“知识分子”这个身份绝不会是对于邪恶、罪行有天然免疫力的，在时代的大苦难中也从不是只扮演着一个纯结、无辜的受害者的角色。

古代的不说了，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一个名叫王世杰的北大法学教授、留欧的法学博士，他在留学时还发表过一些鼓吹集会、社团自由的文章。但他当上南京政府法制局长之后，便新起草了《暂时反革命治罪法》和剥夺工人民主权利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可见以知识分子而为杀人的帮凶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可以说是极端的败类，也不去说他了。复杂、微妙的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本身的毛病。当然，指出这些毛病，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罪有应得。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现在整日抱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在建国至文革前的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的专业工作环境和相对优裕一点的物质经济地位确实是较社会工农大众要好一些，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有些知识分子的确因此而有了高人一等的思想，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确有差距，在他们脑海里总有一种奉承领导、拉宗派山头等毛病存在。

但这些也毕竟是数量有限。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大一个群体。

最基本的事实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本身并没有坚持现代社会的一些普遍性价值原则，而作为个人，恐怕很少有人目睹对别人施加的不公正时有维护公正的道德勇气。这并不是指在“文革”的非常时期中，而是在正常时期，在坚持维护正义所可能付出的代价并未太大的时期。为什么会没有勇气维护正义？因为每一次运动、每一次“打击……”、“反……”总是宣称好人是占95%以上，坏人只是“一小撮”。那么，谁都产生一种希望：自己是在95%以内的。那么，如何表明自己“是”呢？既然明知对他人的指控全无真凭实据，所以也用不着在事实根据的方面去考虑表明自己是好人。于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便是“态度”。所谓“态度”的含义只能是加入对他人的指控。这还是一种较理论性的分析，实际的情形恐怕还包括有各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批倒某人，正对自己有利；被批的某人恰是长期以来一直使自己怀有嫉妒的人；预感自己明天前途难卜，今天先有别人陪垫，多少有平衡，等等。

就这样，或者就那样，大家都不再以正义原则、道德感为念了。

知识分子的悲剧，其种种原因之中，自身的灵魂蚀损也是难辞其咎的。人们在自己泣血控诉或替别人伸冤的时候，很少看到有人敢于写出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他人。收在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可以说，也有这个通病。这是无须讳言的。

六

历史通常是这样的：存在阴影的同时，还存在着光明、存在着向上的、奋发的力量。我国知识分子在经历着坎坷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诚、热爱之情。即使在遭受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摧残，他们仍然忠于人民的事业，以祖国建设、人民富强的大局为重，兢兢业业地在各种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这也是事实，是令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的一段历史。

正如《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取得了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三倍、石油全部自给、工业布局有了改善、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等巨大成就。这一切都凝聚着知识分子的心血和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知识分子仍然忍辱负重、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使我国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

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的铺设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成功，新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这些事实都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贡献。党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说道，“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知识分子正是体现这种力量的阶层，他们贡献于历史、贡献于祖国和人民的巨大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回顾历史，我们更加深了对邓小平1988年夏天接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说的一句话的认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也更加体会到在我们编集本书的同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政治局决议关于主要是反“左”的精神的重要性。我们期望，本书的编选，能从一个方面有助于人们明了这种重要性。

时代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有过的降落在知识分子身上的苦难似乎都成了遥远的过去。但是，过去不应湮没、遗忘。二十多年前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阿多尔诺曾讲过，“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机会。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辑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温济泽 (3)
-----------------	---------

在延安，发生一桩冤案——冤案的起端：

《野百合花》——“反党五人集团”——王

实味之死——曲折的悬案——平反始末

沈从文：在历史的瓦砾堆里	凌 宇 (20)
--------------------	----------

“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孤独·恐惧·自

杀——从文学走向历史的瓦砾堆——进取

与退避——斩不断的情丝——一支悲壮的

骊歌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戴知贤 (53)
----------------------	----------

“新红学派”和《红楼梦研究》——“小人

物”的挑战——毛泽东支持“小人物”——

“对权威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为‘新

红学派’翻案”——非正式平反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	汪东林 (68)
------------------	----------

顶撞毛泽东——毛泽东与梁漱溟谈话、言

- 语冲突、不欢而散——毛对梁严厉批评——
顶撞的升级。被轰下台——批判。醒悟反
悔——闭门思过
- 〔附录〕最后一个儒家 ……………〔美〕艾 恺 (87)
- 晚年的周作人 …………… 文洁若 (101)
- 八道湾的知堂老人——余生译事——断绝
经济来源——皮带、棍子：红卫兵冲进周
宅——扫地出门——“人死声消迹灭”
-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始末 …………… 戴知贤 (112)
- 分歧的开端：文艺思想论争——舒芜的检
讨——林默涵、何其芳批胡风——三十万
言意见书——中央表态：批判胡风思想
——舒芜上交胡风书信——所谓“胡风反
革命集团”——逮捕胡风。判刑十四年——
失去自由的日子——加判无期徒刑——自
杀未遂。精神开始混乱——出狱已是七十
六岁病残老人
- 路翎这个名字 …………… 绿 原 (177)
- 创作生涯的鼎盛期——告别文艺界——精
神分裂——扫垃圾的路翎
- 马寅初和《新人口论》 …………… 周寄中 (186)
- 中国，沉浸在对“人”的崇拜之中——对人
口激增的忧虑——写成有名的《新人口
论》——批“马”运动——接受挑战——辞
职与罢官——平反
- 不该发生的故事——丁玲问题经过…………… 李之珽 (198)
-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审查丁玲
被捕历史——丁、陈申诉——批判丁玲

- “向党进攻”、企图翻案——“反党小集团”
成员扩大。再批判——丁玲进秦城监狱
——“关于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
“阳谋”——1957 徐铸成 (216)
《文汇报》的停刊与复办——毛泽东接见
新闻界代表——“鸣放”高潮——“阳谋”：
引蛇出洞
聂绀弩在北大荒 徐城北 (235)
他带着苦恼、幻想和热诚北上——一件
“纵火案”——“纵火犯”聂绀弩戴上手铐进
监狱——周颖北上寻夫——“归程何处未
依依”
秦灰鼠啮更辛勤 顾学颢 (244)
“惊雷”突发——杯水车薪——艰难拼搏

第二辑

- 吴晗和《海瑞罢官》 子伶、子真 (257)
为什么写《海瑞罢官》——姚文元文章的
出笼——吴晗含冤而死
玉碎 袁 鹰 (271)
知其不可而为之——江青的阴谋——自己
怎么会变成敌人——你太傻了——邓拓给
市委的信——玉碎
傅雷之死 叶永烈 (287)
死亡档案——书斋生活——傅聪的出走
——抄家——遗书
父亲最后两天 舒 乙 (302)

- 太平湖——舍身——被抛弃的“人民艺术家”——你们错啦
- 叶以群的最后十年 叶 舟 (319)
- 人生的一个槛——已经陈述过的昨天——
生活在夹缝中——我不会自杀
- 莫将血恨付秋风 金 山 (335)
- 老革命的女儿——《初升的太阳》——被
捕——“不留骨灰”
- 梁思成之死 林 洙 (347)
- 乌云——我决不离开他——“奈何，奈何！”——探索——摧残——“拼命向前”
- “十年生死两茫茫” 黄秋耘 (367)
- 盖棺论定——空谷足音——相忘于江湖
——十年生死两茫茫
- 我不能不哭 小 琴 (373)
- 父亲被抓走——母亲的失踪——“探亲”
——父亲的遗物——母亲的礼物——不要忘记
- 忆孟超 秦 似 (384)
- 最初的会面——《野草时期》——旧板楼的来客——香港——《李慧娘》
- 一幅名画和一位名画家的命运 江 晓 (395)
- 《开国大典》——改画——“谁画错了？”
- 《史纲评要》和王重民先生之死 崔文印 (403)
- “法家著作”——“争也没有用”——“等以后有机会再写篇有自己观点的文章吧！”
- 向死者告慰 王西彦 (408)
- “挂”——五四作家——“一根肠子通到底”